

◎段崇轩 主编



上卷

九十年代 中国乡村小说精编

◎华夏出版社

I 247/20

九十年代 中国乡村小说精编

◎段崇轩 主编

上卷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十年代中国乡村小说精编/段崇轩主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1

ISBN 7-5080-1601-7

I. 九… II. 段… III. 乡土文学—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99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38.125 印张 816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65.00 元

(全二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面对文明的冲突与嬗变

——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综论

段崇轩

—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望本世纪这最后近十年的中国乡村小说，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片丰收的田野，赤橙黄绿、多姿多彩，五谷茁壮、硕果累累。这丰厚的收成，是脚下这片热土孕育的结果，是无数劳动者汗水的凝聚。九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小说，以它丰盈多样的姿态，告别了沉重的过去，走向一个新的世纪。

从新时期文学到九十年代文学，乡村小说经过了一段辉煌而坎坷的历程。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是乡村小说最兴盛的一个时期，它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一大批起点不凡的作家带着他们厚积薄发的作品，纷纷崛起于文坛，如高晓声、何时光、路遥、张一

弓、周克芹、田中禾、张石山、成一、王润滋、刘恒……此时，中国的农村改革拉开了它有声有色的序幕，乡村小说同农村改革同步前行，及时地表现了变革运动的矛盾和走向，刻画了走向觉醒和自主的农民形象。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寻根文学”的滥觞，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切入中国乡村社会，力图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积淀以及影响、发掘中国农民身上的种种文化性格。文化乡村小说的出现，是乡村小说的一次超越，但它客观上却割裂了乡村小说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转移了作家对现实思考的注意力。紧接着，先锋派小说从斜刺里杀出，新写实小说平地突起，特别是城市文学，以它鲜活而多彩的生活画面、通俗流畅的艺术形式，潇洒自信地登上文坛。在这样一种文学局势中，乡村小说退出了它的“大哥大”位置，自认落伍，渐渐隐退，出现了一时的沉寂。但乡村小说的沉寂并没有太久，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各种各样文学潮流、派别的降温与退场，乡村小说又以它强劲的生活力再度复出，并与城市文学形成了二元并存格局。首先是被文坛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乡村小说，以它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朴素的创作特征，给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并逐渐聚集了一个新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群；其次是还有一些早有建树的乡村小说作家，依然执著地在乡村小说领域里多方探索，借鉴和融合了许多新的现代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形成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多样化趋向。这种多样化趋向同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创作江河汇合，构成了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的多元化态势。

九十年代前后乡村小说的一沉一浮，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农村经过八十年代前期的成功改革，使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随着商品化潮流、市场经济对农村的步步深入，农村改革就变得艰难而复杂起来，“柳暗花明”之后一时间变得“山重水复”。八十年代早期涌现出的大批乡村小说作家，此时已大

都进城和返城,他们熟悉的是八十年代前期的农村生活,而对八十年代后期乃至九十年代的农村生活却疏远了、隔膜了。他们面对变幻莫测的农村现实,突然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把握。这也正是这批乡村小说作家在八十年代晚期以后几乎是作出一种“集体性溃退”的社会原因。大批的主力军退却了,而后继者的阵容还没有形成,乡村小说便忽然间成了一个“失语者”。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整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移,广大农村和农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商品化洪流中,冲击和改变着农村的固有格局和面貌。至此,人们——包括我们的作家才终于认识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决不仅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是一场包括政治、文化、道德等在内的全社会的革命,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过渡的真正开始。中国要实现工业科技的现代化,要同古老的农业文明告别,这并不是国家命运决策者们的心血来潮,而是世界文明进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更有着古老而深厚的文化沉淀。因此,从农业文明向工业科技文明的过渡,就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历史进程,两种文明不断对峙、冲突、融合文明苦旅。毫无疑问,这一历史转型的重心依然在农村,农村还是作家的一块大有可为的厚土。当我们那些年轻的、来自基层的作家们,对农村的变革生活有了较清晰的理性认识之后,波澜壮阔的农村变革便不可阻挡地进入他们的视野,奔涌在他们的笔底。尽管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给人一种泥沙俱下、不精不深的感觉,但它把文学从形式的桎梏里、从个人的琐碎欲望中,拉回到时代潮流和民众生活中间,几乎是全方位地展现了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这不能不说是它对九十年代文学的一份重要贡献。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的再次振兴、多样化乡村小说的走向成熟,标志着

乡村小说在世纪末又进入了一个兴盛期。

九十年代的乡村小说同八十年代的乡村小说相比,无疑显得更加开阔、更加多样。具体说来有两个鲜明的变化,一是超越了题材本身的局限,二是从无序的多样化走向了有序的多元化。乡村小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都一概称之为农村题材小说,这是一个行业化、产业化的概念,它特别强调题材本身的重要性乃至决定性,强调作家选择题材、提炼主题,都要吻合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事件和具体路线政策,它给作家造成的束缚和对文学带来的危害,至今我们依然记忆犹新。新时期文学中,题材的局限虽然逐步被打破,但它的阴影并未彻底消失,它表现在常常发生类同化的主题、题材的创作现象中。九十年代之后,作家在描写农村生活时,往往把表现对象放置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上去审视、把握,使具体题材超越了自身的限制,显示出更宏大、更普遍的思想意蕴来。这是社会生活逐渐多样化、开放化的反映,也是作家主体意识得到解放的体现。乡村小说多元化的倾向,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就已显露端倪,正如评论家丁帆所说:当时的“乡土小说创作是呈多元的、无序的格局,在不同作家和作品那里,这种无序和多元的格局带来的是一种艺术的自由空间”。^①艺术的多元化是一种意味深广的文学现象,它反映了文化思想的多元化,也体现着作家审美的个性化。八十年代是一个开放、浮躁的时代,乡村小说呈现多元化倾向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这种多元化也必然是无序的、不成熟的。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文化思想领域多元化的形成,随着作家个性化的追求和主体位置的确立,中国乡村小说才真正迈向了多元化的坦途。面对九十年代林林总总的乡村小说,要把它们归纳、分类是十分

① 丁帆:《乡土小说的多元与无序格局》,《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困难的,也是相当危险的。但没有理性的概括就没有科学的评论,我以为当前的乡村小说至少可以划归出这样四种类型来,即现实乡村小说、生存乡村小说、文化乡村小说、家园乡村小说,它们相互依存、补充、比照、竞争,共同构成了乡村小说的多元动态格局。

二

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不能敏锐地、忠实地、多方位地表现当代社会的主流生活,那将是一种软弱的甚至病态的文学。八十年代后期直至九十年代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晚生代小说等等,虽然都切入了当代生活,但它们往往侧重于表现个体困扰和自我的欲望等等,在急剧变革的宏大时代面前,就显出一种柔弱、狭小甚至病态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充分地肯定和认识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它继承了传统乡村小说那种开阔、凝重的品格,以现实主义的魄力和勇气,直接深入到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广大农村,强烈地表现了农村变革中农业文明同工业科技文明的对峙与较量,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在商品化潮流中的盲目、困惑、痛苦和蜕变。而且这批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在取材角度上、描写对象上、思想意蕴上、艺术形式上,都表现出与八十年代乡村小说的诸多不同特色。随着这批乡村小说的不断涌现,一个新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群也逐渐形成,其代表性的作家有:刘醒龙、何申、关仁山、刘玉堂、张继、谭文峰、王祥夫、赵德发、向本贵、阚迪伟、孙方友……相对来讲,这批作家年龄较轻,正值创作的旺盛期;且大都来自农村,同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新鲜而丰富的生活积累。尽管他们的创作还存在着许多局限和问题,但他们有自己的优势,相信他们会把现实主义乡村小说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变革时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农村的发展走向。刘醒龙无疑是表现这一历史时期矛盾冲突的出色作家,他的《分享艰难》描述的是九十年代后期一个叫西河镇的镇子里的种种矛盾与纠葛,这里有书记与镇长之间的权利角逐,有一触即发的经济危机,有政府与公安部门的利益之争,有党委、政府同企业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不断磨擦,有猝不及防的自然灾害,有时可能发生“民变”因素……小小的西河镇充满危机、矛盾重重,而这所有的矛盾又与经济这条社会命脉紧紧相连,西河镇折射出的是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变革的一个缩影。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令人震撼地表现了工业文明对淳朴乡村的无情冲击与渗透,企业家倪土改的几个小厂子,使全村的农民大都变成了工人,村民有了钱,村子也变了样。但同时也使村里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更惨痛的是,这位有权有钱的企业家,竟残忍地强暴了单纯美丽的少女倪豆豆,倪豆豆执拗上告,屡告不中,村人、上级以及家人居然联合起来阻挠、迫害倪豆豆。他们需要的是物质、金钱,倪豆豆的青春、生命已变得轻如鸿毛。倪豆豆成了农村走向工业文明的牺牲品,乡村文明像“黄昏的落日”悲哀的沉没。准确、深刻地表现农民同乡镇干部、同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也是这批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的重要主题。王祥夫的《早春》里,种子站内部腐败吃回扣,收购发霉的坏稻种推销给农民,使市区周围许多村子的稻田寸苗未长,愤怒的农民群起反抗,围攻种子站,打死了工作人员,农民同政府之间“硝烟弥漫”。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中,那位丁镇长效仿段书记采冬茶去上贡的做法,把采冬茶作为“政治任务”硬性摊派给村里,这种坑农害农的冒险做法,使村干部们左右为难、愁肠百结,他们巧妙地同丁镇长周旋着、对抗着……农民同乡镇干部、同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还从来没

有像现在这样尖锐激烈、复杂微妙。但可贵的是,这些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不仅在他们的作品中揭示了历史转型期的种种矛盾冲突,更表现了社会进程中蕴藏着的生机和希望,广大民众身上的力量与美德。西河镇(《分享艰难》)虽然深陷困境,但从镇党委书记到普通干部到大多数农民、以至那位财大气粗的企业家,都有着一种“分享艰难”、同舟共济的思想意识,使西河镇每逢困难,都会出现转机。投壁县(《早春》)农民同政府的“种子矛盾”,也终于在县委的改错补救措施和农民的宽容忍让下得以解决。解决社会矛盾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刘醒龙、王祥夫们的“药方”也许还可以讨论,但它毕竟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探索和发现,它是符合生活本身的规律的;从作家对生活的这种探索和发现中,折射出的是作家对生活温暖、乐观的情感态度,以及现实主义作家的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表现农村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在各个方面发生的强烈震荡,以及各种农民的命运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是许多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着笔的重心,而关仁山的艺术表现显得尤为真实、丰富。他在初期的“雪莲湾系列小说”中,就对这一题材领域有所涉猎,在近年的《大雪无乡》、《破产》、《太极地》、《九月还乡》等小说中,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市场经济下的农村生活。紧傍海湾太极地(《太极地》)的那个小村子,与日商合资办了一个矿物泥厂,却完全是歪打正着,在一种极偶然的机遇中办起来的。矿物泥厂前途广阔,但村民、村干部却一无所知,在与日商的协商谈判中,又糊里糊涂地以三七的股份签了合同;看着日商不费吹灰之力就拿走了大量金钱,村民们旧恨加新怨,借机闹事,要撕毁合同、赶走“日本鬼子”。从筹划项目——办企业——签订合同——双方冲突,无不表现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偶然性与盲目性。但农民正是在市场经济的这种“摸爬滚打”中,懂得了世

界,也懂得了自己。杨贵庄(《九月还乡》)的村民,在商品化潮流的驱使下,一窝蜂地进城,又一窝蜂地还乡,还乡之后就蛮不讲理地抢夺种粮大户的土地、粮食。平静的农村发生了新的躁动,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又将发生变动。就在这种不断的分化和聚合中,孕育和成熟了一批植根农村、富有远见、敢于冒险的新的青年农民形象。

现实主义乡村小说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颇有特色的人物画廊。何申对乡村干部“情有独钟”,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从农村最底层的村民组长(《村民组长》)、村长(《村长》)到乡镇普通干部和乡领导(《乡镇干部》、《乡干部老秦》、《穷乡》、《年前年后》)、到县级干部(《穷县》、《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的乡村干部群像。如《村民组长》里那位从只顾个人致富走向带领村民奔小康的黄禄,《乡干部老秦》里那个工作有魄力、有点子、与村民感情深厚的乡政协联络干部老秦,《年前年后》中那位过年时节仍然魂系乡事、左右周旋的乡长李德林等等,都刻画得逼真鲜活、感人至深。这些乡村干部,他们置身于乡村矛盾的旋涡中,真可谓焦头烂额、忍辱负重,他们虽也有常人自私、狭隘、狡黠的一面,但更有着中国传统农民那种质朴、坚韧、宽厚、奉献的品格,正是他们支撑和推动着中国的农村改革。此外,在刘醒龙、谭文峰的笔下,也塑造了许多成功的乡村干部形象,如《村支书》(刘醒龙)里的方建国、《乡殇》(谭文峰)中的张书记,可以说已达到了典型形象的高度。普通农民的形象,在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中也独具异彩,譬如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较早地刻画了一个初具法律意识、执拗地逐级状告村长的女性形象何碧秋;譬如乔典运的《问天》,用喜剧的形式表现了一个面对“选举权利”而变得无所适从、最终放弃选举权的老农民三爷的形象;譬如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作家敏锐地塑造了两个在市场经济中站立起来的

青年农民形象：双根和九月。所有这些形象，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表现方法上，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也有许多新的探索，譬如加大社会生活的信息量，强化故事的背景和环境铺陈，大量运用细节描写等等，使作品增强了真实性、时代感和可读性，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这些乡村小说作家，他们在观照和表现农村生活时所选取的“平视角度”。所谓“平视角度”，即一个作家在看取和表现生活时，要以平等的态度、平行的位置来对待农村和农民，不抱偏见、成见，不先入为主，用一颗真诚、宽容的心走近农村和农民。这同我们过去一些作家采用的“俯视角度”和“仰视角度”是很不相同的。这批乡村小说作家，由于他们的根扎在农村，有的甚而至今还是农民身份，他们在情感和理智上同农村和农民是息息相通的，因此当他们面对描写对象时，他们的心是敞开的、澄明的，农村变革的巨澜微波、农民的命运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毫无遗漏地进入他们的心灵、进入他们的笔底，这正是他们的创作能够敏锐而细腻地表现时代生活的奥妙所在。然而，也恰恰是这种“平视角度”，使他们在生活中陷得太深，入乎其内而难出乎其外，导致他们的作品出现平面、芜杂、琐碎等现象，难以上升到应有的审美高度。这是需要引起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反思和警惕的。

三

在对历史发展的阐释上，当代著名的法国年鉴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史”的历史思想，他把历史划分为长、中、短三种时段，所谓长时段就是指自然环境、社会组织、文化思想传统这样一些长久起作用、变化最慢的现象，他把这称之为“结构”；所谓中时段是指如人口变动、长期的物价演变等变化较慢

的现象,称之为“局势”;而所谓短时段是指如战争、革命等变化最快的现象,称之为“事件”。这三种时段常常是相互并行、交错、影响,构成了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布罗代尔这一历史思想对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它表明社会、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变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变或渐变的一面。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就要看到变中的不变,或者不变中的变,庶几才能写出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来。如果说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着力展现了中国历史转型期间农村变动的一面,那么在另外一些作家笔下,则侧重表现了乡村社会中不变或渐变的一面,如农村中亘古的生存环境、地域特征,农民世代代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那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农民性格中的固有个性与文化积淀……这些作家如贾平凹、铁凝、闫连科、周大新、李贯通、迟子建、东西等,他们并非纯粹的乡村小说作家,但他们常常把深情的目光投注在黄土地劳作的农民身上,关注着他们的生存命运、思索着他们同现代化社会的巨大反差、或者批判着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中国的农业文明存在了数千年,而真正的农村改革只不过二十年,尽管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实绩辉煌,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是,文明的转型才刚刚开始,还有许许多多农村依然停滞在封闭、落后的原始状态,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仍旧沿袭着世代代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照旧是这方土地的精神主宰,中国要过渡到现代工业科技文明,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从这些表现农村生存状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依旧是一个古老而凝重的“乡土中国”。

读这些生存乡村小说,就像看一幅幅发黄的旧照片。铁凝的《孕妇和牛》,用工笔画式的手法,描绘了一幅朴素、和谐、渺远的乡村风俗画,黄昏的落日、空旷宁静的原野、一座突兀挺立的汉白玉牌楼,穿越麦地的阡陌村路上,行走着一个怀孕的、步态

安祥的少妇,还有一头同样怀了孕的叫黑的牛。这位少妇是幸福的,人长得俊,又嫁给了一个好人。但她面对那块古老石碑上的十七个海碗似的大字,却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无知与可怜;看着一个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们,又想到自己即将出世的孩子,突然觉得有一种恐慌和不安。“住在山里望不出山去,眼光就短;可平原的尽头又是些什么呢?”这位沉浸在世世代代妇女生活模式中的少妇,对平原之外的广大世界、对陌生的文化知识,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遐想和渴望。铁凝对这位俊俏、温顺的乡村少妇,表现了一种深切的赞美,但对她生存世界和内心天地的狭小,又传达出一种深重的同情。曹乃谦笔下的“温家窑”村的农民们,则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这里大山围困、土地贫脊,连起码的温饱也难以解决,村民们过着一种浑浑噩噩的日子。一个刑满释放的青年回到村里,大讲在“里面”吃白面、大米、肉,打篮球、拔河、演节目,竟使在场的农民大开眼界、充满神往(《晒阳窝》)。一个光棍青年忍受着性的饥渴,温家女人感激他帮忙种地,真诚地想用自己的身体回报他,光棍青年却忍受着渴望,一次又一次地压抑着自己(《福牛》)。这就是偏远农村人们的生存状态,食和性竟成了他们人生的最大困扰,农村的现代化离这里是何其遥远。

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和睦相处,形成了一种古老而和谐的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隔膜、功利的情形下,农民之间那种融融乐乐的关系就显得尤为珍贵。迟子建在她的一系列小说中,怀着一颗敏感而洁净的心灵,走进冰雪复盖着的北国乡村,痴迷地发掘着农民之间那种真诚的关系和他们美好的人性。《亲亲土豆》通过一对年轻夫妻面对丈夫的不治之症、所引来的曲折的看病经历,表现了夫妻之间那种刻骨铭心、相依为命的情感,它已不仅仅是

一种爱情、更是一种亲情，令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雾日牛栏》中，只因继父的一巴掌，使宝坠失去记忆，变得痴痴呆呆，继父于是自责不安了一生、乃至忧郁而死，人性中的向善力量竟是如此强大！再如赵德发的《通腿儿》、张继的《麦子的语言》等，作家都以一种崇敬之情，抒写了农村人与人之间那种真挚的情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把“人和”放在社会生活的首位的，这种“人和观”至今深植在农村的土壤中。但在另外一些乡村小说中，作家则用审视、批判的眼光，表现了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和丑陋的人性。周大新的《步出密林》用强烈的故事情节，表现了人在长期的密林生活中留下的残忍本性，今天依然存活在农民身上，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幸福，不仅残忍地折磨动物，同时也残忍地折磨人类自己，造成了人类永难摆脱的痛苦与灾难。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描写了瞎子、聋子、哑巴一门三残、相濡以沫，但同不瞎、不聋、不哑的健康人却难以勾通，且常常要受后者的欺辱。作品故事奇特，内涵丰富，直逼人性深处。这两种小说，因作家的视角和态度不同，所表现出的思想内容也就大相径庭，但都揭示了生活中真实的一面；前者表现了农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下形成的美好品格，后者则揭示了农民身上所残留的原始本性。不同角度的观照和表现，敞开的恰好是农民人性层面的全部。

中国农民性格中坚韧、执著的个性，始终是作家们开掘不尽的一座富矿。闫连科的《年月日》把中国农民的这一独特个性，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先爷与那条瞎狗，面对千古大旱、无粮断水的绝境，竟能奇迹般地活下去，并用他（它）们的生命孕育、保留了一棵玉蜀黍，依赖的就是中华民族那种顽强、机智、勤劳、固守土地的精神与性格。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一样，先爷也成了一个代表民族性格的象征形象。中国的农民可

以为一棵树的年龄问题,上访告状十五年(贾平凹《制造声音》);一个乡村姑娘能够为全村的吃水大事,光明磊落、义无反顾地去“贡献”自己的青春与贞操(铁凝《秀色》);一个年迈的乡政府炊事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鼎鼎大名,用孱弱的身躯杀死凶猪,头枕猪头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李贯通《高枕》)……不管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多么渺小、行为是怎样“荒诞”、自尊心是何等“虚无”,但他们的殉道精神、献身壮举、生命的尊严无疑是神圣而美丽的,在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古老民族的顽强生命与博大精神。

四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对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在知识界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文化热”运动,它直接促进了“寻根文学”的诞生。许多有思想的作家,把他们的艺术目光从现实生活中撤离出来,投注到穷乡僻壤、蛮荒的异域,以及一些怪异的民间人物身上,去探索民族的文化之根。旗子打的是一面,但出发点却迥然有别,有的探索的是民族文化的劣根,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有的寻找的是优根,用意则在承袭弘扬、建造新的文化,可谓殊途而同归。但 these “寻根文学”的作家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他们的笔触伸向了中国的乡村,因为在乡村中才蕴含、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传统文化。他们果然满载而归,一时间收获了大批引人瞩目的文化乡村小说。“寻根文学”使乡村小说产生了一次突破性的发展,使乡村小说具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品格。至此以后,文化乡村小说作为乡村小说整体中的一个支流,一直发展到九十年代,优秀之作层出不穷,造就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乡村小说作家。

这里我们首先应该谈到的是贾平凹,他对乡村生活的体验

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释文化的痴迷,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罕见的,这使他对中国乡村生活和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感应与理解。他在创作题材上并没有画地为牢,但描写更多的还是农村和农民;一部《废都》展现的是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但他却硬要把一个养牛的农妇和一头有思想的牛安置在都市的街道和院落中来,且整个古都都流动着一股浓浓的乡村气息,“废都”是一座乡村化了的都市。贾平凹没有一般知识分子作家那种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他只是按照他对生活的感受与体验去写作,但他表现出的生活和人物却处处蕴含了文化。中篇小说《美穴地》描绘了战乱年代一个叫北宽坪的小村子里的故事,我们从这个村子里大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内部矛盾、兴衰变迁中,从那位乡绅姚掌柜同姨太太的冲突纠葛中,从浓墨重彩展现的踏风水宝地的活动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在这里的积淀,感受到“男尊女卑”的男权文化、封建迷信文化的荒谬与虚伪。贾平凹和盘托出的是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

与贾平凹不同,陈忠实与韩少功则有着自觉的文化审视与批判意识。他们深入乡村和农民,不仅用自己赤诚的感情感受和体验着那份古老和深厚的生活,同时也用清醒的理智理解、剖析着观照的对象;他们特别注意吸取、融汇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哲学思想,构筑着自己的思想城堡;当他们选定了表现对象时,他们也要耐心地通过资料、传说、民情风俗等等,对这方土地进行一番研究和思考,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深邃、鲜活的思辨色彩。正是这种生命体验与理性思辨的高度结合,孕育了九十年代两部独创性的长篇杰作:陈忠实的《白鹿原》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这是乡村小说在二十世纪末期的重大收获。《白鹿原》是一部博大、精深、自足的艺术世界,描绘了白鹿原这块魔